

宋代《春秋》学与 宋型文化

李建军◎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建军◎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代《春秋》学与宋型文化/李建军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7-5004-6966-7

I. 宋… II. 李… III. 文化史—研究—中国—宋代
IV. K244. 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7404 号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980 1/16

印 张 32.25

插 页 2

字 数 560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什么是宋型文化，宋型文化与宋代《春秋》学有何关系，是建军博士论文涉及的两大问题，而前者又是后者立论的前提。关于宋型文化，前辈学者和当代学者都有论述，他们不同程度地认可由唐而宋的社会与文化所经历的重大变化，并间接或直接地涉及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的概念与内涵，“尽管他们对唐宋之变是否属于社会形态的转变，是否存在文化范型的转化意见不一”，而建军所持的观点十分明确：“唐宋之变乃是巨变。”之后，文章从文化心理、文化气度、文化主体、文化风格和文化成就五个方面，对两型文化的差别作了具体的比较：“唐型文化是一种豪放进取的外向型文化，而宋型文化是一种细腻深微的内敛型文化”；“唐型文化是一种宽容开放、比较驳杂的纳异文化，而宋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封闭、较为精纯的本位文化”；“唐型文化是一种雅正醇厚的贵族文化，而宋型文化是一种雅俗协奏的庶族文化”；“唐型文化是一种高亢明朗的暖色调文化，而宋型文化是一种淡雅舒缓的冷色调文化”；“唐型文化是一种大放异彩的阶段集成的文化，而宋型文化是一种鼎盛造极的全面成熟的文化”。自此，两型文化从概念到内涵都得到了更为具体的界定。

对于唐宋文化转型的原因，建军首先从物质层面上指出，由唐到宋土地制度的转变，宋代商品经济空前发展，市民阶层的异军突起和市井消费的空前隆盛，使“建筑在这种物质基础之上的宋型文化不可能还是一种贵族文化、精英文化，而应是一种适合广大庶族士绅和众多市井细民口味的庶族文化和市井文化”；其次从制度层面上指出，宋代成熟的科举制度使得一大批寒门俊士能够通过科场跻入仕途，而“一贯的右文政策又给广大的文人学士提供了优渥的生活条件和尊贵的社会地位”，士为知己者用，“经由这些满怀用世之志的士人创造出来的宋型文化理所当然地具有极为浓烈的淑世色彩”；最后从精神层面上指出，“宋型文化有打通天人之隔、探索宇宙本体，从而

建构人生终极依据的宋学作为其精神内核”。“于是，缺少精神内核的唐型文化成了相对驳杂的纳异文化，而据有精神内核的宋型文化成了比较精纯的本位文化，两型文化的分野于此灼然可见”。我以为，建军对两型文化差异的高度概括是有历史依据的，对两型文化形成原因的深入分析也是很有说服力的。

宋型文化与宋代春秋学的关系，是全书的主体部分，也是全书最具难度的部分。既然使用了宋型文化的概念，《春秋》学与构成宋型文化的诸多方面，都应该纳入作者的视野。为此，作者选择了最具代表性的政治、理学、文学、史学，论述其与《春秋》学的关系。初读此书，我心里对此其实是有疑虑的，因为对于事物间关系的论述，易犯的毛病是失于牵强或过于简单，尤其是对其中的逻辑过程，往往未及充分展示，结论却匆匆而来。就作者所选择的四个方面看，考察《春秋》学与史学、政治、理学的关系，难度相对稍小。《春秋》及其“三传”本身便是历史或史论性质的著作，对后世史学的影响自不待言。此外，自《春秋》经学化以后，其在政治大一统、思想大一统中的作用已经非常直接，《春秋》之于政治、理学，贡献不可谓不大。故对作者而言，只需深入到上述关系所涉的各个方面，认真分析相互的关联，并将其清晰地描述出来，便能达到本书预期的目的。当然，以上所言，认真作起来并不容易，单以《春秋》学与政治、史学、理学的关系而论，每一个方面都可以作为专题来研究，并成就为一部专著。我以为作者就上述论题，已经作得不错，而本书难度最大的，应是探讨《春秋》学与文学的关系。

《春秋》经传无不以事实为基础，而《左传》又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叙事性的历史著作，作者对宋人从叙事文学的角度解读经传的文学意蕴，以及宋人以《春秋》经传为素材的赋对之作和史论散文的分析，尤其是对吕祖谦《东莱博议》义例、立意、行文和思想的分析，已达到了曲尽幽微的地步。但真正考较作者学术眼光与文学功力的，是论《春秋》学与宋代诗文关系一节。作为纯文学的诗文，其个体性、主观性远远超过其他；学术之于文人，犹如融入血液的因子，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几乎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正因如此，可以说我是带着挑剔的眼光来读有关章节的。挑剔的结果是，我认为作者的努力，已换来可观的收获。如本书第四章第二节，作者以尹洙、欧阳修为例，论《春秋》义法对宋代散文创作的浸润，最能见出作者的用心。作者指出，宋代很多古文家自觉涵化《春秋》义法进行古文写作，而“尹、

欧的贡献在于，他们引入《春秋》义法以修史撰文，运用更为纯熟，特色更为鲜明，成绩更为显著”。其下作者又重点以欧阳修散文为例，分别论其蕴蓄绵藐的意蕴、文简意深的用辞、纡徐婉曲的章法、严谨信实的文风、期于有用的取向与《春秋》义法的“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劝善”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指出，清人陈衍以“六一风神”标举欧公散文的审美特质与艺术成就，而《春秋》义法与史迁笔法是其达到这一境界的源头活水。但作者所论并不到此为止，他更进一步地探究根源，称史迁笔法其实也源于《春秋》义法，所以，“是欧公对《春秋》义法的涵化成就了欧文的深婉谨约，并最终赢得了‘六一风神’的美誉，从这个意义上讲，《春秋》义法对宋代散文的浸润，孕育了‘六一风神’”。我想，读者读到这里，可以做出这样的评判：作者并非为了追求论文形式的完整而虚设章节，敷衍成辞；作者对这些问题的见解，的确是经过了认真体察和深思熟虑的。

书书写到这里，产生一点联想。本书作者说：“几乎所有的学者都不否认唐宋之际有巨大的社会变迁和文化嬗变，尽管他们对唐宋之变是否属于社会形态的转变，是否存在文化范型的转换意见不一。”在此歧见之中，我同意傅斯年先生《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的意见：“就统绪而言，则唐宋为一贯；就风气异同以立论，则唐宋有殊别。”依我的理解，傅先生所说的“统绪”，包含有社会形态的内容。我也同意本书作者所说的，唐宋之变“虽然还够不上社会形态的转变，但却足以导致文化范型的转变”。简言之，唐宋文化类型的嬗变，是在同一个社会形态下实现的。在这里，我想借傅先生的“统绪”一词，略作发挥。

所谓“统绪”，内容并不单一。春秋战国而至秦汉，完成由诸侯专政、大夫专政而至天子专政的过程。因为有了“天子失政”的惨痛记忆，秦汉在政治体制上精心设计，以进一步确保君主的天下私有与权力世袭，实现政治的大一统，从而形成整个封建社会世代相承的政制统绪，这样的统绪，实可谓之“政统”。同时，汉代更惩予秦因暴政而遽失天下的历史教训，在世俗君权的基础上，抽象演绎出君主集权的理论，以教化与奴化臣民，实现思想的大一统。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云：“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既然贯通天地人三道的唯有君主，故“《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春秋》之大义也”。（《春秋繁露·玉杯》）董仲舒所论，既是为君权的辩护，也是以圣人经典实现对君权的规范。相对而言，世俗君权属形而下的范畴，故可谓之器；君权理论属形而上的范畴，故可谓之道。这个道在封建社会世代相承，亦可谓之“道统”。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构建政治的大一统，还是思想的大一统，其理论所借助的资源，不外先秦儒家的典籍，其中尤以孔子的《春秋》为尚。《春秋繁露·楚庄王》云：“《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孔子以《春秋》教授学生，固不免有自己的价值评判。它们在汉被经学化以后，汉儒依据现实政治的需要，对《春秋》经传也有自己的取舍和阐释，从而形成经学的学术传统。这样的学术传统在封建社会世代相承，或可谓之“学统”。更有甚者，由于文人以经学为其终身学养的根基，以致后来无论是抒情写意或是以文载道，原道、征圣、宗经的价值取向皆或显或隐地对其内容和风格发生影响，从而形成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传统。这样的传统在封建社会世代相承，姑可谓之“文统”。我想，以上所说的绵延不绝于封建社会的政统、道统、学统和文统，或许就是傅先生所说的“统绪”的主要内容。“统绪”既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最基本的构成，由汉唐而宋元明清，因改朝换代或现实政治的需要，统治阶层不能不对“统绪”作结构性调整。这种体制内的自我调整不仅造就了所谓的汉型文化、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的文化形态，更是中国的封建社会成为超稳定结构的原因之一。我想，建军的这本书所以能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展开对含政治、史学、理学与文学在内的宋型文化与宋代《春秋》学之间关系的分析，是以以上的背景为其坚实依据的。

由此还产生一点联想。有能力在体制内作不断地自我调整，是中国封建社会与封建文化极端成熟的表现，但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莫大悲剧。正是这种自我调整的能力，使中国封建的社会形态柔韧而顽固，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至于经学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无可替代的作用，本书已有很好的说明。在宋代《春秋》学中，无论是改革的，还是保守的，都能从经学中找到合意的思想资源并把它们打造成为自己需要的思想武器。例如王安石，尽管他声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但因其改革依然是在体制内进行，乃不得不作《三经新义》以证明改革与圣人之言并无矛盾。王安石的所为，不过是承继了汉以来形成的经学传统。这种传统经不断地发扬光大，进而衍生为经学文化，影响至为深远。以致到了封建社会的垂死期，康有为仍不得不借用今文经学家的手法，从经学中取其所需而加以附会，实施

“托古改制”，鼓吹君主立宪。经学与经学文化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惰性，原因在它与其所附丽的体制总是相辅而成。诚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只要封建的社会形态和政治体制尚在，经学便大有用武之地。后来的改革家即有“三不足”的勇气，倘不突破旧有体制并彻底摒弃经学作风，最终都有被碰得头破血流的结局。建军大著所涉及的问题，其实是可以给人以很多启示的。

记得建军的硕士论文题目是《〈诗经〉与周代宗教文化研究》，本书则是在项楚先生指导下撰写的博士论文。我仔细比较了两部论文的内容，发现他对经学与经学功用的关注是一以贯之的。不仅如此，建军在两部论文中表现出的进步与创获，更远远超出了我的意想。建军的成绩既得力于项楚先生的悉心指导，也与他具备优秀的科研素质与不懈的探索精神有关。建军对学术的执著在同学中是得到公认的。师生每有聚会，他常常坐在一旁和同学讨论问题。也往往是在这个时候，我喜欢不动声色地从旁观察，他的手势和目光，无不透出近乎迂阔的认真和专注，以致到了旁若无人的地步。也许正是这种迂阔，才能使人甘于寂寞，乐于吃苦，勇于创新。从本书所附“宋代《春秋》著述目录”和参考文献，可知作者的一丝不苟和艰苦付出；学术的成就和荣誉，是建军这样的人应该获得的报偿。

建军待人，话语不多，却细心诚笃，与师友有很深的感情。他去年获得博士学位后，远赴浙江台州学院任教，成都师生每每相聚，总要念叨起他。“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他心系师友，心系灾区，却因信息不通，忧心如焚。前些天我终于收到他发来的问候短信，并告诉我他正与台州的川籍师生一道，为父老乡亲筹集善款。值此惨痛艰难的时刻，举国震悼，爱心如潮，我真切感受到人世功利固不可废，人间温情尤其值得珍重。有此感念，乃冒着余震，时断时续，写完这篇承诺在前，却延迟完成于后的序言。

万光治

2008年5月18日

目 录

绪论	(1)
一 概念的梳理:《春秋》学衍生历程的回溯	(1)
(一) 从“春秋”到《春秋》:通名化为专名	(1)
(二) 从《春秋》到《春秋》经:鲁史升为儒经	(2)
(三) 从《春秋》经到《春秋》传:一经衍为三传	(4)
(四) 从《春秋》传到《春秋》学:传注蔚为显学	(6)
二 选题的考量:宋代《春秋》学研究的省思	(8)
(一) 研究的省思:成果与问题	(8)
(二) 选题的考量:价值与方法	(16)
第一章 宋代《春秋》学的发展历程	(18)
第一节 宋代《春秋》学的文化背景	(18)
一 从唐型文化到宋型文化	(19)
(一) 唐宋社会的巨大变迁	(19)
(二) 唐宋文化的范型转换	(25)
二 宋型文化的脉络与结构	(26)
(一) 宋型文化的历史脉络	(26)
(二) 宋型文化的内在结构	(30)
第二节 宋代《春秋》学的演变阶段	(31)
一 创发新义期:北宋前期、中期	(31)
(一) 时代背景:儒学复兴,经学革新	(31)
(二) 本期特色:不惑传注,创发新义	(36)
二 借经淑世期:北宋后期、南宋初年	(42)
(一) 时代背景:靖康创巨,民族痛深	(42)
(二) 本期特色:牵合时政,借经淑世	(43)

三 经史交融期：南宋前期、中期	(52)
(一) 时代背景：理学成型，史学兴盛	(52)
(二) 本期特色：事义会通，经史交融	(54)
四 归结守成期：南宋后期、晚期	(65)
(一) 时代背景：国势衰微，圣学确立	(65)
(二) 本期特色：踵武前贤，归结守成	(66)
第二章 宋代《春秋》学与政治	(80)
绪言：《春秋》学与政治的历史渊源	(80)
第一节 宋代《春秋》经传的政治解读	(85)
一 经世视角下的《春秋》经传研究	(85)
(一) 主要文献：着眼于经世的两宋《春秋》学著述	(85)
(二) 典型事件：王安石与《春秋》博士的三废三立	(87)
二 孙复《春秋尊王发微》的经世思想	(89)
(一) 尊王思想	(90)
(二) 攘夷思想	(105)
(三) 孙复经世思想的历史价值	(116)
三 胡安国《胡氏春秋传》的政治本色	(119)
(一) 内政方面之主张	(122)
(二) 邦交方面之立场	(148)
(三) 胡《传》政治本色的历史评判	(183)
第二节 宋代《春秋》学对政治生活的浸润渗透	(187)
一 以《春秋》议礼	(187)
(一) 议宗庙之礼	(187)
(二) 议禘祫之礼	(189)
(三) 议时享之礼	(189)
(四) 议忌日之礼	(190)
(五) 议后宫之礼	(190)
二 以《春秋》断事	(191)
三 以《春秋》决狱	(193)
四 用《春秋》尊王黜奸	(194)
(一) 用《春秋》尊王	(194)
(二) 用《春秋》黜奸	(196)

五 用《春秋》倡言复仇	(198)
六 用《春秋》说解灾异	(200)
七 借《春秋》进行政争	(202)
第三章 宋代《春秋》学与理学	(204)
绪言：《春秋》学与理学的时代联结	(204)
第一节 宋代《春秋》经传的理学阐发	(206)
一 理学视角下的《春秋》经传研究	(206)
(一) 胡安国《春秋传》的理学色彩	(207)
(二) 罗从彦《春秋指归》的理学气息	(214)
(三) 蔡沆《春秋五论》的理学涵蕴	(216)
(四) 张洽《春秋集注》的理学质素	(217)
二 宋代《春秋》经传研究的理学取向——以二程《春秋》学 为例	(221)
(一) 理学视角观《春秋》	(224)
(二) 伦理维度解《春秋》	(226)
(三) 天人应合论《春秋》	(242)
第二节 宋代《春秋》学对士节世风的砥砺涵育	(245)
一 《春秋》大法砥砺士节	(247)
(一) 胡安国知行合一卓有气节	(247)
(二) 吕大圭以身殉国大节凛凛	(250)
(三) 家铉翁义不二君彰显士节	(251)
二 《春秋》宏义涵育世风	(252)
(一) 《春秋》厉气节忠义	(252)
(二) 《春秋》弘民族尊严	(253)
(三) 《春秋》论贤责其备	(254)
(四) 《春秋》责臣诛其心	(254)
第四章 宋代《春秋》学与文学	(256)
绪言：《春秋》学与文学的时代遇合	(256)
第一节 宋代《春秋》经传的文学体察	(258)
一 《春秋》经传意蕴的文学解读	(258)
(一) 先宋对《左传》文辞叙事的揣摩论析	(258)
(二) 宋代对《春秋》经传意蕴的文学解读	(260)

二 《春秋》经传素材的文学著述	(268)
(一) 以《春秋》经传为素材的赋对之作	(268)
(二) 以《春秋》经传为素材的史论散文	(269)
第二节 《春秋》义法与宋代诗文著述	(298)
一 《春秋》义法的基本内涵	(298)
(一) 表层结构: 属辞比事而不乱	(299)
(二) 深层结构: 辞微指博寓劝惩	(304)
二 《春秋》义法对宋代诗学批评的渗透——以杨万里、张戒 为例	(311)
(一) 理论基础:《诗》与《春秋》妙相通	(312)
(二) 表现形式:《春秋》义法作诗论	(315)
(三) 缘由意义: 吸纳有故垂戒远	(322)
三 《春秋》义法对宋代散文创作的浸润——以尹洙、欧阳修 为例	(324)
(一) 背景:《春秋》义法从湮没到重显, 由修史而撰文	(325)
(二) 征迹: 从尹洙的简而有法到欧阳修的深婉谨约	(328)
(三) 意义: 羽翼古文运动, 孕育六一风神	(352)
第五章 宋代《春秋》学与史学	(359)
绪言:《春秋》学与史学的历史因缘	(359)
第一节 宋代《春秋》经传的史学诠释	(362)
一 《春秋》经传体例的史学改编	(362)
(一) 改编为纪传体	(362)
(二) 改编为国别体	(364)
(三) 改编为纪事本末体	(365)
(四) 改编为图、谱、表	(368)
(五) 改编为类书体	(371)
二 《春秋》经传意蕴的史学解读——以吕祖谦为例	(372)
(一) 吕祖谦《春秋》学著述考辨	(372)
(二) 吕祖谦《春秋》研究的经学维度	(374)
(三) 吕祖谦《左传》研究的史学取向	(379)
第二节 《春秋》义法与宋代史学著述	(395)
一 涵化《春秋》义法的宋代史学著述	(395)

(一) 尹洙《五代春秋》	(395)
(二) 欧阳修《新唐书》	(397)
(三) 孙甫《唐史记》、《唐史论断》	(401)
(四) 范祖禹《唐鉴》	(406)
(五) 司马光《资治通鉴》	(409)
(六) 胡寅《读史管见》	(413)
(七) 朱熹《资治通鉴纲目》	(417)
二 《春秋》义法对宋代史学著述的影响——以《新五代史》 为例	(425)
(一) 语境：政治生态·道德需求·学术风习	(428)
(二) 表征：《春秋》义法与《五代史记》的撰修	(429)
(三) 价值：义法史学杰作·经史结合范例	(449)
结论：宋代《春秋》学与宋型文化	(453)
一 宋型文化与宋代《春秋》学的路向	(453)
(一) 学术路径：舍专门务会通	(453)
(二) 学术取向：不泥古常疑经	(455)
(三) 学术重心：略名物重治道	(457)
(四) 学术范式：弃训诂精义理	(459)
(五) 学术视野：破经学藩篱尚文化融会	(462)
二 宋代《春秋》学与宋型文化的衍生	(463)
(一) 宋代《春秋》学和政治的相互吸纳与宋型文化的民族 意识	(463)
(二) 宋代《春秋》学和理学的彼此融会与宋型文化的道德 精神	(465)
(三) 宋代《春秋》学和文学的交互渗透与宋型文化的创造 精神	(467)
(四) 宋代《春秋》学和史学的双向会通与宋型文化的会通 精神	(468)
附录：宋代《春秋》著述目录	(471)
参考文献	(487)
后记	(501)

绪 论

一 概念的梳理:《春秋》学衍生历程的回溯

(一) 从“春秋”到《春秋》:通名化为专名

《国语·楚语上》记载,楚庄王曾就太子教育之法咨询申叔时,申回答说: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之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①

此处申叔时将“春秋”与“世”、“诗”、^②“令”、“语”、“故志”、“训典”相提并论,说明此时“春秋”还不是某一国某部书的专名,而可能与“世”、“语”等一样,是当时诸侯国某类书的通名,诚如清末民初学者吴曾祺《国语韦解补正》所云,“观此,则知凡诸侯之史,皆谓之《春秋》,不独鲁也”。^③ 战国初期的墨子曾说过“吾见百国春秋”,^④《墨子·明鬼篇》更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的明确提法,更能说明当时“春秋”确是某种历史载籍的通名。实际上,这种历

① 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85—486页。

② 此处的“诗”,指当时各诸侯国之“诗”,还不是后来意义上的《诗经》。

③ 徐元诰:《国语集解》,引吴曾祺《国语韦解补正》语,第485页。

④ 此为《墨子》佚文,见孙诒让《墨子间诂》附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06页。

史载籍，从今存的鲁史《春秋》来看，当是一种编年大事记式的国史。^①当然有些国家的国史似乎还有自己的专名，如晋叫做“乘”，楚叫做“檮杌”^②，而“鲁史似乎没有别的名称，就叫‘春秋’。也许是由于鲁史为儒家素所研习，随着儒家势力的张大，‘春秋’也就逐渐成了鲁史的专名”^③。

（二）从《春秋》到《春秋》经：鲁史升为儒经

《春秋》是鲁国史官接续记录的国史，书成众手，难免有义例驳杂、文法不一之弊。到了孔子时代，该书应该经过了一次整理。《春秋公羊传·庄公七年》云：

“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④

实际上，与《公羊传》一样，《谷梁传》、《左传》也有“君子修《春秋》，因旧史之文而有变更”的记载。^⑤那么，这位被称为“君子”的整理者究竟是谁呢？《公羊传》、《谷梁传》、《左传》虽未旗帜鲜明地指出，但三传的很

① 至于为何要以“春秋”命名此种国史，还是杜预之说较为圆通。他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说：“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春秋左传正义》，李学勤主编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意思是“错举”春秋二季可以概括年之四时，故以“春秋”命名编年国史。

② 《孟子·离娄下》云：“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孟子注疏》，李学勤主编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

③ 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④ 《春秋公羊传注疏》，李学勤主编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

⑤ 浦卫忠：“君子修《春秋》，因旧史之文而有变更。《公羊传》所说‘不修《春秋》’与‘君子修之’，将君子所修《春秋》与旧史之间的因革揭示得十分清楚。《左传》也用‘书’、‘不书’来表示《春秋》与旧史的区别。《谷梁传》说：‘梁亡，郑弃其师，我无加损焉，正名而已矣……’又说：‘其曰北燕，从史文也。’显然也是指沿袭旧史文而已。而《谷梁》的‘进之’、‘君子不夺人名’等语，更明确地指出了君子之修《春秋》，也有修改与更夺。君子修《春秋》的原则，也就是《谷梁》所说的‘《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即文字以修改，史实不可更改。”《孔子、〈春秋〉及〈春秋〉三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年第1期，第47—48页。

多记载还是表明了孔子与《春秋》的密切关系。^①到了孟子，他以毋庸置疑的语气褒赞孔子修《春秋》。^②到了司马迁作《太史公书》，也是毫不犹豫地吧《春秋》的著作权归于孔子。^③至此，孔子根据鲁史修《春秋》的说法遂成定谳，两千年来，学界虽屡启疑窦，但都因缺乏过硬证据而难以推翻成说。^④

① 《春秋·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谷梁传》释曰：“孔，氏；父，字谥也。或曰，其不称名，盖为祖讳也。孔子故宋也。”（《春秋谷梁传注疏》，李学勤主编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所谓孔子“故宋”、“为祖讳”，也就是说孔子在修《春秋》时为自己的宋国先祖讳名。《谷梁传》此处解释实际上表明了孔子是修《春秋》之人。《春秋·昭公十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公羊传》释曰：“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子曰：“如尔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其词，则丘有罪焉耳。”（《春秋公羊传注疏》，第493—494页。）《公羊传》曰“其词，则丘有罪焉耳”，也表明了孔子与《春秋》的密切关系。《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冬，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天王狩于河阳”，《左传》释曰：“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春秋左传正义》，第457页。）《左传》此处文字可以理解为是孔子解释“鲁之《春秋》”何以要记作“天王狩于河阳”，也可以理解为是孔子说明自己所修《春秋》书法的一个原则。后一种理解可以表明《春秋》确是孔子所修。

② 《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注疏》，第178页。）《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注疏》，第226页。）

③ 《史记·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43页。）又《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浹。”（《史记》，第509页。）

④ 唐代刘知几作《史通·惑经》，开始置疑“孔子修《春秋》说”。宋代王安石讥《春秋》为“断烂朝报”，实际上也是否认了孔子曾经修过《春秋》。明朝徐学谟在《春秋亿》中认为，《春秋》乃据旧史而成，其中本来就有缺文，并非孔子所笔削。到了20世纪，在疑古思潮推动下，许多著名学者如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钱玄同（《春秋左氏考证书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等，都认为《春秋》既非孔子所作，也非孔子所修。直到近些年，仍有不少学者如浦卫忠（《〈春秋〉三传之比较研究》）、姚曼波（《〈春秋〉考论》）、赵伯雄（《春秋学史》）等对“孔子修《春秋》说”持怀疑态度。综观他们的怀疑意见，虽言之成理，但终究缺乏坚实证据，都还难以推翻成说。

从战国到秦汉，儒生们薪火相传，接过孔子删正过的古代典籍^①继续整理，并且在不断抬升孔子地位的同时又不断抬升孔子整理过的这些典籍。到了战国末期，这时出现的《礼记·经解》^②已经有了这样的说法：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③

这里列举《诗》、《书》、《乐》、《易》、《礼》、《春秋》，虽然并未在每种之后加上“经”字，而作者把这些典籍全都列于《经解》之中，故实际上已经称之为“经”。至于明确地把上述六种典籍称作“六艺”（即“六经”），最早而又最可靠的记载，则见于西汉初年贾谊《新书》的《六术》篇。^④至此，经过孔子整理过的鲁史开始厕身于儒家“六经”之列，《春秋》变成了《春秋》经。

（三）从《春秋》经到《春秋》传：一经衍为三传

《春秋》问世以后，在战国秦汉之际，随着儒家学派的声望日隆而广泛传播，为之作传者也非常多。《汉书·艺文志》“春秋家”所列，就有

① 旧说认为：孔子删《诗》、《书》，正《礼》、《乐》，赞《周易》，修《春秋》。此说虽不可全信，但如果说孔子曾经整理过这些文献作为其讲授的教科书，那是没有问题的。

② 洪湛侯：“《礼记·经解》是出于荀子门人或秦初博士，目前尚无明文可考。要之，出于荀子之后、秦代之初这一段时间，大致是不会有问题的。”《诗经学史》，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06页。

③ 《礼记正义》，李学勤主编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8页。

④ 《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熟）知其故矣。’（郭庆藩《庄子集释》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31页。）此处记载的“六经”之说虽然明确，然而《天运》本身却有问题。篇中屡言三皇五帝，其中“三皇”一词，于古无征，最早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由此可知《庄子·天运》成书时代是很晚的，本身真伪也成问题，那么它的记载又怎能成为经学史征信的依据呢？